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科研项目】

# 1966—1976 年的天津

刘小荣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科研项目】

# 1966—1976 年的天津

刘小荣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66~1976年的天津/刘小荣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98-0893-1

I. ①1… II. ①刘… III. 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研究—天津市 IV. ①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8964 号

责任编辑:潘 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9mm×239mm 1/16

字 数:248 千字

印 张:15.25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893-1

定 价:29.00 元

---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任 王以鸿

副主任 李文芳 李大勇 于 建

## 前 言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内乱,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天津紧邻北京,在这场持续10年的浩劫中也遭受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失。这是一份后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遗产。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艰难地从贫困的沼泽、落后的泥潭中拔出双脚,既需要大胆前进、开拓进取;也需要谨慎小心、三思而行。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那场内乱结束35年,改革开放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大力推进,环渤海经济圈正在成长为中国第三个增长级的今天,我们仍需要进行反思和研究。

那个时代的许多亲历者至今仍然有说不尽的“文化大革命”情结——或憎恶或压抑,或默语或长叹,或反思或回忆。笔者作为“过来人”,在大量翻阅天津当时各个方面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从此天津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一场长达10年的严重灾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天津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直接干扰破坏下,深受其害。

从1966年5月开始至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夺权阶段。在这期间,首先教育系统,接着全市各条战线都陷入混乱状态。天津市党政部门大批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冲击和迫害,全市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为稳定局面,人民解放军奉命介入天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

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的前提下,尽力使社会局面实现稳定。同时,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专案组,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从中共九大召开至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活跃的阶段。这期间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在极“左”的错误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错误的会议。在10年的内乱中,天津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经济指标落空,如计划到1970年工业总产值要达到140亿元,实际上连同后来划归天津市的5个县在内,才达到96.42亿元。在此期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用实际行动努力生产,使各项事业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取得进展。

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阶段。这是江青反革命集团进一步阴谋篡党夺权,直至最后灭亡的阶段。这期间,江青曾8次来天津,对“批林批孔”进行指导,将小靳庄树为全国农业典型,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破坏,加上计划本身的“高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唐山大地震,又给天津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和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坚持生产和建设,满怀希望,努力工作,万众一心、团结奋斗,战胜了地震自然灾害,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的进展。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有着严重破坏性的全面内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存在的对运动的抵制和斗争,包括广大党员、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也不等于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错误。作者进行这个时期历史的专题研究,目的就是要以史学研究者的身份,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真实地记录、客观地反映、正确地评价、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

1966年至1976年的内乱,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误入歧途的结果;严重的内乱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左”的错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由于广大干部群

众的抵制和抗争,经济建设持续进行,社会也仍然在进步;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但党的组织仍然存在,绝大多数党员仍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依靠自身力量最终结束这场内乱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同时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体,才能对内乱有所限制,并最终战胜林彪、江青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胡绳讲过:没有“文化大革命”,改革不会来得这样快。“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借鉴。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了教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他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他们的论述,坚持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同心同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反思那段历史,客观地反映那段历史,对我们今后深入地研究那段历史,从对历史的反思中汲取教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和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做好新形势下的各项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目录

CONTENTS

---

|                   |      |
|-------------------|------|
| 前 言               | /1   |
| 天津在内乱之初           | /1   |
| “三五”计划遭劫难         | /12  |
| 初期内乱对党组织的冲击       | /17  |
| 十六中事件             | /29  |
| 清理阶级队伍            | /35  |
| 十年中的教育革命          | /41  |
| “工业学大庆”始末         | /53  |
| 内乱时期的“三支两军”       | /73  |
| 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及党的一元化体制 | /86  |
| 天津的“农业学大寨”        | /93  |
| 所谓“万张集团”          | /118 |
| “二二一讲话”与“两黑一砸”    | /125 |



- “6985”涉县铁厂的创建 /130
- 中共九大对天津市党的建设的影响 /134
- 天津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 /138
- 天津市医务人员到边疆基层“安家落户” /147
- “四五”计划的实施 /155
- 六千吨水压机的建造 /162
- “七零四七”——天津地铁的修建 /169
- 深受中共九大影响的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171
- 各项事业在艰难中发展 /173
- 艰难起步的天津石油大化纤 /178
- 小靳庄被树为全国典型 /185
- 内乱时期的整党建党 /193
- “五五”计划的实施 /203
- 天津的抗震救灾 /205
- 社会各界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215
- 根治海河造福人民 /225
- 后 记 /236

## 天津在内乱之初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美苏不断掀起反华浪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国内，毛泽东对党内矛盾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偏离实际，越来越把阶级斗争、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结论，认为只有发动“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党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于是 1966 年，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所谓的“革命”一开始，就把中国投入到一片混乱和荒诞之中。天津市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同全国一样，善良老实人无所适从，对许多事情不能理解，但还是遵循着党内一贯的传统，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各项决定。投机钻营的人胡作非为，兴风作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多年形成的法纪秩序、道德规范、是非标准，一时间或荡然无存，或完全颠倒。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这场“大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内就被冲击得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 一、从学术讨论到文化革命

自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天津舆论界起初并没有作出什么反应。但进入 1966 年 4 月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4 月初，中共天津市委组织召开宣传、文教系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会后，市委宣传部组织 10 次共约一万人参加的报告会，介绍所谓批判吴晗的情况，动员工农兵参加批判。4 月中旬，市委又召开常委会议，批准建立文教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工作。5 月上旬，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6 日，《天

津日报》发表社论《立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去》，配合市委工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鼓动。5月11日，《天津日报》刊载了姚文元文章，题目是《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伙开黑店”，“继《海瑞罢官》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智慧地向党进攻”。至此，天津市的报刊上，批判文章渐渐增多，文化、教育、学术领域的大革命，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宣传、发动，在天津逐渐开展起来。

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工作会议，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第二书记赵武成，书记处书记胡昭衡、王亢之、张淮三及常委白桦等53人赴京出席会议。会上学习讨论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等文件。《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知》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指示各级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月30日，全市县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开始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从6月2日起，《天津日报》开始大量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批判学术界权威人士著作的文章等。《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写道：“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一版中还转载了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并配有《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说“陆平、彭珏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同一天《天津日报》第二版又登出张敏秋等三人《北京出版社是‘三家村’黑店黑货的一个批发部》的文章，认为“北京出版社妄图将一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关系到党和

国家命运前途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将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政治斗争,化为‘纯学术’之争”。同时认为“北京出版社妄图将这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仅仅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这一天,《天津日报》第三版还登了司马洪涛的《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文,批判翦伯赞“污蔑农民革命,宣扬阶级调和”;“美化地主阶级,讴歌帝王将相”;“吹捧剥削阶级的‘让步’政策,宣扬活命的奴才哲学”等。

《天津日报》这个党的地方机关报,大量转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反映了天津市委在宣传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紧跟政治形势,放手引导天津市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

6月3日,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精神。<sup>①</sup> 强调“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要求大家打破框框,放手发动群众,把突出政治的大讨论,转到“文化大革命”上来。就在同一天,在北京,中共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第一书记,撤销陆平、彭珏云的一切职务。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该校的“文化大革命”,代行党委职权。这两条消息在广播中一播出,对天津市的运动起了莫大的“鼓舞”作用。《天津日报》上刊登天津人参与批判的文章逐渐增多。同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后,《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声称“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个夺权斗争”,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在这篇社论的鼓动下,位于天津的河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工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河北财经学院、河北艺术师范学院、河北轻工业学院、天津中医学院等院校分别举行集会,声援南京大学师生,声讨所谓“反革命分子匡亚明”。人们纷纷举行集会,给报社投信投稿,参与大批判。6月7日开始,在《天津日报》第五版连篇累牍地批河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漆侠,表明天津不只转载《人民日报》等重要报纸的重要批判文章,也开始针对天津的实际,具体地“革某些人的命”了。6月9日,《天津日报》发表社论“向资产阶级‘权威’开战”,天津的各大专院校开始揪、批本单位的权威。

---

<sup>①</sup> 此时的天津市还是河北省省辖市,1967年改为直辖市。

## 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努力控制局面

对于来势迅猛的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河北省委、天津市委领导最初的反应正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些部委和各大区负责人检查中所说:“跟不上形势”,“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sup>①</sup>。1966年4月7日,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召集宣传部、文教政治部、文化局、教育局、天津日报社、文学研究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作了研究和部署,<sup>②</sup>接着,天津市委批准建立文教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工作。5月7日,市委宣传部召开区委、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传达省委宣传部4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工作会议精神,布置全市干部从5月份起,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内容,学习毛泽东的“两讲两论”<sup>③</sup>等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文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些工作部署,是天津市委领导对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贯彻执行的表现,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所做出的最初反应。但是具体如何开展这场运动,市委并不清楚。5月中旬,天津市开始批判《海瑞罢官》,《天津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田汉、吴晗、夏衍、翦伯赞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受到公开批判。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在全社会展开的批判活动,天津市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响应,要求各级党委把学术批判问题作为突出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继续搞好自一月份开始的全市突出政治大讨论,切实加强领导。

5月12日,王亢之根据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指示,召集宣传部、文教政治部有关同志进行研究,决定13日新闻界百人集会,声讨邓拓等人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4日,文艺界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2000多人的声讨大会;15日,教育界举行万人声讨大会。可是当天晚上,市委宣传部接到省委宣传部远千里副部长的电话,让转告白桦:张承先(省委书记处书记)意见,“万人声讨大会不要开了,还是开小型座谈会。发言质量高的,还可以选一些

①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② 当时中共天津市委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③ 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

在报上发表”。根据电话通知精神,文艺界、教育界原定的千人、万人声讨大会都改为小型声讨会,新闻出版界的声讨会则有500多人参加。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当时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确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根本不知道这场运动究竟应该怎么搞法,只是尽量跟着全国形势走,同时又不能让局面失控。

5月13日,市委宣传部根据省委、市委指示精神,对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拟了四条注意事项,并电话通知各区委、党委宣传部,主要内容是:1.各单位不要搞大型的声讨会,只开些小型的座谈会,进行批判、声讨活动。批判声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邓拓身上,不要分散目标。2.各单位开过座谈会以后,可以选内容充实、质量较好的发言送报社、电台采用。见报的作者必须是“左”派。3.要求各基层党委加强对墙报、黑板报、广播站的政治思想领导,这些阵地和工具一定要掌握在“左”派手里。防止坏分子钻空子,借机放毒。4.在批判声讨活动中,主要是彻底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行,进行有理有力的批判,暂先不采取漫画、快板、相声等文艺形势进行批判。<sup>①</sup>5月中、下旬,天津市委政治部主任王金鼎,副主任赵平以及天津市委书记谷云亭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四点注意事项。天津市著名中学十六中<sup>②</sup>也根据这四点注意事项制订了“四项原则”,除重申市委宣传部的四点注意事项外,还强调不要将矛头引到教室中去,目标要集中对准邓拓等,强调加强党支部的领导,把阵地牢牢掌握在手,不贴大字报,所有墙报、黑板报和送往电台、报社的稿子都要审查,不能停课等。

天津市委宣传部拟定的四条注意事项,显然与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不符。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评论员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刊登之后,迫于形势的压力,天津市委不得不收回四条注意事项,但市委一些领导在往后的岁月里却为此被批为“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假批判,真掩护;牺牲‘车马’,保护‘将帅’”,“故意制造种种阻力,转移目标,颠倒黑白,打击革命派,压制群众运动”<sup>③</sup>等,受到残酷迫害。

① 1966年市委宣传部的“文化大革命中大事记”,天津市档案馆馆藏资料。

② 即耀华中学。天津市耀华中学是市教委直属的公立重点高级中学,位于和平区南京路106号。1927年,庄乐峰先生创办天津公学。1934年天津公学更名为耀华学校,取“光耀中华”之意,1952年改名为天津市第十六中学,1988年复名为天津市耀华中学。

③ 《彻底清算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滔天罪行》,《天津日报》1967年6月28日。

随着《天津日报》开始大量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北京大学 7 人的大字报、批判学术界权威人士著作的文章，在天津，大字报开始报铺天盖地地轰击各级党组织。十六中的大字报质问“四项原则”的由来并批评校党支部压制运动的行为。尽管形势发生迅猛的变化，天津市委依然想方设法控制局势。6 月 2 日上午 8 时，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瑞华在市委召开宣传部、团市委、教育局、市委文教部的负责人开会，商量如何引导运动的发展，提出大字报可以贴，大小会可以搞，“对领导有意见可以贴到一间小屋子里”，等等。王金鼎等连续几天去十六中，与校党支部商讨办法，并召开了全校声讨邓拓大会。大会上只许批邓拓，不支持给党支部提意见。会后，有的同学把给党支部贴的大字报撕了。河北大学附中在团市委的引导下，有人贴出《谁敢动党支部一根毫毛，我们就跟他拼到底》的大字报。在一中，团市委的领导也指出，“叫学生把斗争矛头指向邓拓黑帮”，“不要一齐指向（学校的）领导，忘了邓拓”。

然而，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6 月 3 日以后，人们纷纷举行集会，给报社投信投稿，参与大批判。至此，河北省、天津市不只转载《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的批判文章，也开始针对河北省、天津市的实际，具体地“革某些人的命”了。当时各级党的负责人都不理解，不明白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为什么支持学生乱批判乱揪斗党组织的负责人？这场运动目的究竟是什么？

6 月 7 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省委的要求，向十六中等一些重点中学陆续派出工作组，领导他们的“文化大革命”。针对中学一些师生揪住“四项原则”问题不放的现象，马瑞华、万晓塘、周茹等市委领导人先后亲自对中学生们作报告，稳定局势，制止混乱，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6 月 21 日，天津市十六中的部分学生在共青团天津市委、市学联召开的全市高三学生庆祝改革高考制度的大会上散发《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信中“揭发批判”马瑞华对学生讲话中的所谓“严重错误”，批判市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指出市委有黑线，号召中学生起来反对万晓塘、张淮三等市委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河北省委曾作出过一项规定：在教育部门，天津市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省委直接领导，天津市委负责领导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决定显然表明，河北省委当时对运动的发展估计不足，没有料到在运动初期天津中小学比高等学校乱得早、乱得凶。当

时市委主要领导们仍在北京开会<sup>①</sup>，听到马瑞华的汇报后，立即“亮明旗帜”，说明市委是革命的。市委有关领导组织各校师生对十六中这封信进行辩论，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对十六中的工作组几次增派人员，扩充人数，并由工作组改称为工作队，工作队直属市委领导，以加强对运动的引导和控制。

6月23日，在派往各学校工作组、工作队的努力下，运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批判、围攻各校党支部负责人的行为被保卫市委、维护单位领导的行动所取代，认为十六中的那封《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是“大毒草”的人占了上风。

十八中、二十中、吴家窑中学等学校的工作队都向学生宣传说：市委没有问题，市委是革命的，马瑞华是革命的。有的工厂党支部也召开党、团员及干部会议，向大家打招呼，不接待到厂车间里来宣传反市委的学生，安排党支部的老工人和学生辩论，证明市委没问题。

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直到7月中旬，天津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对本次运动很不理解是可以肯定的，尽管很不理解，天津市委和各级党组织仍然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中共中央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毫不含糊。但由于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也不知道其最终目的是什么，因此表现得与当时大多数地方党委一样“很不得力”。然而，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凭着党性原则和一种工作惯性，在这场运动的最初阶段，基本控制了天津的局面，阻止了大范围的混乱现象，保证了天津市政治、经济、文教、卫生、各项工作和工、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 三、形势急转直下

正当市委和派往各校的工作队的工作初见成效的时候，7月底，毛泽东认为北京市派往各高校的工作组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起了反作用，决定撤销工作组。<sup>②</sup>天津市委闻讯，立即着手陆续撤走中学和大、中专院校的工作队。市委以及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工作队前一个时期采取的分期分批、有步骤地开展“文化大革命”，控制形势，防止混乱的努力遭到彻底否定。一些人批评市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中共中央、华北局也因马瑞华

---

① 1966年5月21日至7月23日，北京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市53位主要领导都出席了此会。在此期间，全市工作由市委组织部部长马瑞华主持。

②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曾派公安人员到十六中维持秩序一事对河北省委、天津市委提出批评。事后市委不得不对十六中事件进行处理。

8月初,文教部负责人王金鼎在《天津日报》上被点名批判,成为天津市领导干部中受到报纸点名批判的第一人。8月6日,十六中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和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这是一个万人大会,有分会场。市委书记万晓塘在会上违心地做了检查,表示支持十六中部分学生散发的《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并宣布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决定:“因镇压十六中学生”,撤销马瑞华的市委组织部部长职务。可以看出,市委领导迫于形势,是不得不这样做的。从8月初以后,全市市级干部也受到点名批判。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会议终于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8月21日,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在天津市和平区民园体育场中心会场和各区分会场召开有6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万晓塘主持并在会上讲话。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至此掀起高潮。随后,工作队全部撤离学校。

首都红卫兵扫“四旧”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发表后,天津市各学校红卫兵纷纷上街扫“四旧”、抄家。25日,天津市副市长李中垣到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技工学校宣讲十六条,被红卫兵和学生围攻;26日,这些半工半读技工学校学生和北京红旗中学的红卫兵又到天津市委门前集结,冲进大楼,殴打工作人员,抢走文件。这所学校成为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市委对着干的颇为有名的学校。

自8月26日到9月2日,对市委大楼的围攻和在这里进行的辩论,持续了一周时间。<sup>①</sup>万晓塘等市委领导出面接待了这些半工半读技工学校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们,并参加了辩论。据档案资料记载,辩论的内容主要是这样三点:1.“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2.天津市委是不是革命的?3.对于“犯错误”的人进行批判,应不应该侮辱他们的人格,殴打他们的身体?对于

① 李中垣:《八十述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